

插图珍藏版

魏巍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起跑线◎雁宿崖战斗小景◎朝鲜同志◎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战士和祖国◎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前进吧，祖国！◎这里是今天的东方◎写在凯歌声里◎依依惜别的深情◎阮氏芳定◎广平的夜◎寄故乡◎怀仁堂随笔◎七月献辞◎在银色的晨曦中◎我的老师◎风雨路上◎醒来吧，丁玲！◎难忘那位无名作家◎怀念一位伟大人物◎红杜鹃◎他还活着◎为张振山写碑文◎送别艾青◎敬悼杨成武老将军◎他是日本人民的良心◎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路标◎塔里木大会战◎这才是青春开花处◎瑶池在人间◎处女地◎日出◎热海◎黄河，母亲的河◎您好，延安！◎看家乡戏◎鸭绿江情思

魏巍散文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J267

W6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巍巍散文/巍巍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

ISBN 978-7-02-007472-3

I. 魏… II. 魏…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269 号

责任编辑:张 晴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李 博

巍巍散文

巍巍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3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472-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自二〇〇五年始，我们在此基础上先后选出四十二种，作为“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一、二、三辑出版。此次又选出八种，作为第四辑出版。

本丛书每册二十万字，另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9年6月

目 录

我的起跑线	1
雁宿崖战斗小景	11
朝鲜同志	19
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	31
战士和祖国	38
谁是最可爱的人	46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51
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	55
前进吧,祖国!	63
这里是今天的东方	72
写在凯歌声里	78
依依惜别的深情	80
阮氏芳定	88
广平的夜	94
寄故乡	100
怀仁堂随笔	103
七月献辞	106
在银色的晨曦中	110
我的老师	112

风雨路上

——记戴笃伯 118

醒来吧,丁玲! 130

难忘那位无名作家 134

怀念一位伟大人物 140

红杜鹃 145

他还活着 151

为张振山写碑文 155

送别艾青 162

敬悼杨成武老将军 164

他是日本人民的良心

——悼念东史郎君 170

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 173

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

——致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勘探队员们的送别辞 190

路标 200

塔里木大会战

——石油战线巡礼之四 206

这才是青春开花处

——石油战线巡礼之七 218

瑶池在人间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游黄龙日记 224

处女地

——一九八四年八月游九寨沟日记 227

日出 230

热海 234

黄河,母亲的河 237

您好,延安!	242
看家乡戏	246
鸭绿江情思	252
重读五十年前的读者来信	256

我的起跑线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下了火车,来到山西的古城临汾。街道上行人如织,尘土飞扬,我放下行李,坐在路边的小吃摊上,要了一碗豆腐脑什么的吃起来。

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古老的长安城滞留了半个月。当年我十七岁,这是我离开家乡郑州的第一次远行。临行之前,我的良师也是我最热心的忘年朋友——一个失去关系的老党员黄正甫,给他的两位熟人写了信,让他们能够帮助我,把我介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怕我路费不足,还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了三块钱。可是,到了西安,要找的这两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都推辞了。这样我就不得不贸然去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站在办事处的门洞里,隔着窗口同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谈了话。因为我没有介绍信,我的要求显然被婉拒,他说抗大已经招考过了。我的梦想幻灭了。我惘然若失地在门洞里站了好几分钟。幸亏旁边墙上贴着另一张招生广告,仔细看,原来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要人。我问工作人员:“这个比抗大怎么样?”他答道:“也差不多。”于是,我就在当天夜里扛上行李上了火车,折返潼关,于朝阳初起时渡过黄河。在风陵渡的小火车上冻了一夜,这才来到临汾。

坐在小摊的矮凳上,我一面吃东西,一面张望着大街上的行人。这时太原已沦于日军之手一个多月,临汾城已成了晋中的抗敌重镇。不仅阎锡山的指挥中心设在此处,他还办了一个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的民族革命大学。南来北往的军人很多。以彭雪枫为处长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郊区不远的地方。街上也偶尔有佩戴着“八路”臂章的军人出现。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他们之中有女兵,甚至有似乎穿上军服还不久的家庭妇女。他们谈笑自若地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候,我心里是多么地羡慕他们呵!为什么他们都能当上八路军呢?为什么我就遇到这么多困难呢?

坐在尘土飞扬的小摊上吃东西,对于我这个穷学生来说,是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我口袋里的钱。我离家只带了十五元钱,加上朋友送的路费也才十八元。经过西安半个月的耗费,已经只剩下五元钱了。我入伍前的一切花费,都必须在这个数内解决。

付过饭钱。我开始同一个人力车夫讨价还价。因为我离开家乡,不自量力地带了一些书,裹在行李中,其中有杜甫的诗集、鲁迅的书,还有一本很厚的政治经济学。这些都是死沉沉的,走远路我如何能背得动呢?所以必须得雇辆车。幸好价钱并不贵,到临汾西北的蒲县,一块多钱就可以了。

从临汾到蒲县有一条蜿蜒起伏的黄土公路。我们在滚滚的黄尘中踽踽独行。到日落时分还没有赶到。只好住在路边紧靠山坡的一家乡村小店。

第二天一早,我刚要启程继续西行,偶尔抬头,见店旁墙壁上贴着一个通告,说是一一五师军政干校已由蒲县移往赵城(现属洪洞)马牧村去了。我只好掉头从原路再返临汾,乘夜班火车于当夜赶到赵城。一个人扛着行李行走在黑黝黝的田野里,摸索着,进了这座陌生的小城,找了一家小店住下。

这时，赵城已经迫近前线。传说敌我正对峙在霍县一带，距此仅九十华里。城里已充满战时的气氛，小店里人不多，只住着几个国民党部队下来的散兵。大家都睡在一条大炕上。同他们聊起来，他们都很悲观。说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厉害，连刺刀也比我们长几分，你刺不到他，他就刺到你身上去了。我无意同他们多谈，只是注意询问八路军的所在和马牧村的位置。

第二天用过早饭，我即兴冲冲地上了路，一路打听向着马牧村奔去。路上我低头一看，我自家乡出走时穿的一双鞋子已经破烂不堪，很不像个样子。正好遇上一个卖棉鞋的妇女，我就买了一双，立时穿在脚上。不想在庄稼地里行走，被高粱茬子扎了一个大洞，怪可惜的。幸好很快就到了马牧村，又为喜悦的情绪所代替了。

马牧是一个很大的镇子。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都驻在这里。一一五师军政干校驻在一个小学校里。在这里，接待我的是一个矮胖和蔼的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就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名叫方炽。曾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穿着黑色学生装风尘仆仆的青年人，问明来意，笑了笑，马上就同我对面而坐，开始了入学考试。方式很简单，就是口试我三个问题。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是什么？三、你自己的志愿和目的是什么？由于我在家时就受到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何干之的《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和上海出的杂志《自修大学》，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第三个问题更可以借此倾吐我出来的满腔热忱了。回答完毕，他立刻挥挥手满意地笑着说：“录取了！”我在这里饱饱地吃了一餐饭，大米饭和飘着一层辣椒油的豆腐洋芋（土豆）汤，于当天把行李搬来，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军服，左臂也戴上了十分醒目的“八路”的臂章，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战士。想起这一段，我

任何时候都忘不了方炽同志。多年前他在辽宁省任高等法院院长,我曾到他家里探望他。算来他已经逝世十多年了。

二

当时一一五师军干校还处于草创阶段。抗日青年每天都三五成群地陆续到来。学校还没有固定的教员,只偶尔有一位首长来校讲课。加上师主力北上执行任务不久,就合编到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去了。

随营学校是一个很正规的军事学校,其前身是红军教导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随营学校,东渡黄河随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务是在战地培训下层干部,随时补充部队。校长韦国清,政委陈明,教务处长阎捷三,政治处主任张正光,政治总教张平凯。他们在红军中都是久经锻炼且富有办学经验的老干部。

随营学校的所在地洪洞县白石村,也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村子里有一个像地主庄园似的高墙大院,校部就驻在这里。我们来到白石村,又经过一番入学考试,共编为七个队,共千余人。我被分到文化程度较高的四队,住在一个名叫五圣寺的古庙里。庙前是一个小广场,对面是一座戏楼,旁边就是校部的那个大宅院。一九三八年元旦过后,正规的训练就开始了。

四队的领导是很坚强的。队长徐国夫,政治指导员欧阳平,军事教员陶汉章。他们虽比我们大不了很多,却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练成熟的军人。队长徐国夫军容严整,谦逊诚朴,和蔼可亲。指导员欧阳平性格活泼,能唱兴国山歌,晚会上他唱的《送郎当红军》,很受大家欢迎。他上的政治课,也使我们这些外面来的大中学生为之倾倒,想不到工农干部竟有这样高的政治水平。据说,日后毛主席曾在延安的干部会上表扬过他。那时毛主席正在提倡“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欧阳平

是作为“工农干部知识化”的模范事例提出来的。军事教员陶汉章,年轻英俊,多年后得知,那时他已在写一本关于游击战术的专著,不过当时并不知道。那时我们这些还很幼稚,更没有经过什么锻炼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一些久经锻炼的老干部的带领下起步的,怎么能不飞快地前进呢!

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目主要是制式教练、班排进攻防御、紧急集合以及着装训练,晚上衣服、帽子、绑腿各放在什么地方,都由队长或军事教员一一做出示范。我还记得夜间在白石村外,队长教我们如何以北斗星和女帝星找出北极星这个恒星以判别方向。此后在敌后抗战的岁月里,在冀中平原上,我一个人单独夜行,就是以这种方法来辨认方向的。

同学间的关系,也是团结融洽的。我所在的二班,班长张行言,瘦长瘦长的,戴着一副近视镜。据说是个大学生,处处以身作则,很像是个党员。解放后他在安徽大学当校长,几年前我曾去看过他。副班长张绍闵(后改名张立达,曾任辽宁省科协主席,省委文教长,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当时面黄肌瘦,甚为憔悴,曾在监狱中受过摧残。还有一个叫陈尔东(后改名林韦,解放后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大约是太原师范的学生,性格活泼,热情奔放,能指挥唱歌,也会作曲,后来在延安写过一首《黎明曲》,其中有“我们为反抗来到人间,怕什么流血牺牲!”的句子,为大家所传唱。此外还有两名大学生,一位是北大的高自新,外号人称“高老夫子”,每逢讨论会,他总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剩下的就是王千祥和我了。王千祥是山西洪洞人,和我差不多是同年。我俩在班里年龄最小,学历又浅,也许出于自卑感,在讨论会上常常胆怯得不敢发言。此后王千祥发展成为很干练的军事干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篇报道《打败美国野心狼》,就是他写的。离休前已是沈阳军区装甲兵的副政委了。以

上我们这七八个人,就挤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度着紧张而有意义的生活。

救亡室(现在称俱乐部)的工作搞得很活跃。成员都是由学生选举的。记得救亡室主任是邢亦民(后来曾任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经济委员是陆小山。墙报委员似是时颖和贾霁。缪正心、汪威尔、胡磊(后改名胡刚)都是救亡室的活跃人物。他们常常组织歌咏比赛、文艺晚会、游戏活动。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抗日歌声,充满青春朝气。每隔一两周,还有新的墙报出版,贴在五圣寺的大殿里。我从家里带出来的一首五百行的长诗,那是离家之前在黄河岸上流着眼泪写成的,也大胆地拿出来在墙报上发表了。最大的文艺活动,就是上海救亡第一队在白石村的演出和临汾刘村学兵队与我们的联欢,在五圣寺对面的戏楼上演出了许多精彩难忘的节目。白石村的军民人等掌声不绝。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大音乐家贺绿汀,他刚创作出来不久的《游击队歌》,就亲自到我们四队来教唱。我还记得,他身披一件平型关的战利品日军的黄呢大衣,风度潇洒地一面打着拍子,一面轻轻地哼着口哨儿。

场面最热烈最难忘的,要算是看朱总司令打篮球了。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马牧村,距白石村并不很远。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元旦过后,总司令亲自来校视察。晚饭后的游戏时间,他同学们们一起打篮球。这一举动轰动了全村,不仅学员来看,把白石村的老百姓也引来了,将整个球场围了个风雨不透。大家的目光都聚精会神地望着这个满脸风霜朴实得像老农民似的军人。当他接到球的时候,显然那班年轻人怕把他撞伤碰倒而只在他周围虚张声势。而他的投篮却很准,一举投中,场上就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潜台词:在中国的大地上,谁见过这些普通的士兵同赫赫有名的总司令在一起打球?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人与人的真正的平

等关系？正是这一切，比政治课更有力地说明着一切，改变着和融化着我们这些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或者说，我们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默默地接受着无声的熔化……

三

随营学校于一九三八年元旦后开学，至二月底正常的训练进程被打断了。

这时，侵占太原的日军，经过整顿后继续沿同蒲路南犯，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取临汾。总部确定，随校西渡黄河合并到抗大总校。因为情况紧急，部队的行动是急促的。事实上这是一场新形势下的训练。

第二天，当我们转移到临汾以西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急速的防空号声，接着我们的上空出现了几架敌机。这时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行进的部队正暴露在强烈阳光照射的平原上，没有什么可以隐蔽的地方。大家正在犹豫慌乱，指挥员一声令下，让我们都隐伏在田坎之下，而田坎下正好有二尺多宽的阴影。尽管敌机飞得很低，而且在我们的上空盘旋了一圈，却并没有发现我们。而这时的临汾城及城郊，阎锡山的部队，还有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却乱成一团。几架敌机正得意洋洋地在那里俯冲轰炸，不时浓烟四起，完全被烟雾笼罩住了。待敌机过后，我们即起来拍拍土，井然有序地继续向西转移。为什么友军受到了那么大的伤亡，而我们却毫无损失？眼前这亲身经历的一幕，不能不使我们在内心里深深感到老红军干部作战经验的丰富和指挥的沉着。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子，长途行军自然是很艰苦的。背上负着很沉重的行囊，班里有两支步枪还要轮流背着，开始走三十里已经有些吃不消了，而每天正常的行军是六十里，走到地方已

经一动不愿动了。第一天我的脚已经走肿,且磨起了血泡。同学们也是如此。在行军途中,我不断看到有扔东西的。一天,我看到路边整整齐齐放着一双皮鞋,不知是前边哪个扔的。我在家虽然没有穿过皮鞋,但也只有看两眼罢了。随后又发现路上有扔棉花的,显然是嫌从家里带出的棉被太厚,已经不堪重负,就随手揪出一把一把棉花丢弃在田野上。这样做的绝不止一人,因为在冬季光秃秃的田野上,那随风飞舞的棉花就像春天的柳絮一般。今天回忆起来,自然是些笑谈。

但是,人毕竟是要锻炼的。过了一段时间,渐渐也就习惯了。何况我们身边并不缺少可供学习的榜样。那些早一两个月来到随校的同学,就比我们强得多。例如陆小山(后来是沈阳空军副司令),虽是山东人,个子却不高,他是经济委员,每天都提前出发打前站,安排伙食,号房子,比我们辛苦多了,但却显得很能干,很坚强。我们的班长张行言,高高的个子,背上被包,扛上枪,头向前伸着,简直像一匹负重远行的骆驼。副班长张绍闵虽然瘦弱不堪,但依然显出十分坚毅的神色。这些对我们都是无声的鼓舞。渐渐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轻快,每天走个六七十里已经很习惯。我们穿过吕梁山时,吃水很困难,行了一天军还要到十几里外去抬水,也並不以为苦了。

行军中我们接受的最严格的训练,就是群众纪律。老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检查我们一切行动的标准。部队住下,要挑水、扫院子,宣传群众;部队离开要捆铺草,借物送还,群众委员要检查纪律。随地大小便是绝不允许的,必须挖茅坑,而且还要“瞄准”,临走前还要掩埋。老红军的这一套纪律,就在行动中逐渐养成了。

在长途行军中,是同志间交流思想谈心的好机会。副班长张绍闵同我谈得最多,我把离开家乡前的经历几乎都同他谈了。面孔总是红红的陈尔东同我谈得甚为相同。有一次他在谈话中

忽然问我：

“你的笔记本前面写的‘韦红青’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自己随便取的一个名字。”

“我问的是那名字是什么意思？”

“韦当然是‘魏’的谐音，红青是说我要做一个红色青年。”我笑着说。

当时，我还不敢说要做一名共产党员，只能这样说了。日后回想起来，也许他们已经把我当做“培养对象”，我的这些话很可能都向支部作了汇报。到了延安后的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八年的四月份我就被吸收入党，张绍闵就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否则我的入党不会这么快的。

穿过吕梁山，经过吉县，于三月初到达黄河边的龙王庙，已经来到壶口。据说这正是惊蛰日的前一天。此时冰封的黄河已经开始解冻，老百姓说再过一天，冰上就不能过人了。后来得知，沿黄河南下的敌人，距我们不过二十里路，形势是非常险峻的。可是校首长韦国清异常沉着镇定，仍站在黄河岸边指挥我们从容渡河。此时，黄河早已开始融化，有的地方冰块已经裂缝陷落。塌下的冰块约有一两丈深。前面的部队在裂缝间架上了木板。队长让我们每个人都挟着一把谷草，以便把它铺在冰上不致滑倒。当我踏着冰块走到河中时，看见陷落下的一块厚冰已经有一丈多深了，那上面倒着一头可怜的驴子，正是刚才失足跌落下去的。但是我们随营学校的全部人马终于安全渡过壶口到达了西岸。据后来得知，同样由临汾过来的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却受到了很大损失。

越过黄河，我们已经距日夜向往的延安不远了。又经过两天行军，当我们终于远远望见嘉陵山上的宝塔时，同学们是如何地欢腾雀跃呵！我们立刻就要投入一座更大的熔炉了。……

六十年后，回忆起随营学校的这段生活，我总是充满感激之